

当AI释放“信息烟雾弹”——

超七成受访大学生 希望提升研发技术减少“AI幻觉”

实习生 贾明皓 何 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军利 毕若旭

“AI在文献检索上的效率确实无可替代，能快速聚合相关研究，但当AI撰写新闻稿时，偶尔会对信息进行错误拼接，甚至虚构信息来填补报道空白。”作为新闻传播相关专业学生，就读于中国海洋大学的翟锐捷对AI的使用始终保持警惕，这种警惕源于对新闻真实原则的坚守：“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而AI生成的内容往往游走在‘看似合理’与‘事实错误’的灰色地带，稍不注意就会触碰新闻失实的红线。”

所谓“AI幻觉”，指的是AI会生成看似合理实际却错误的信息，常见的表现是编造一些不存在的事实或细节。近期，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针对“AI幻觉”话题开展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461份。调查显示，97%受访大学遇到过AI提供错误或虚假信息的情况。

AI给出的就是“完美答案”？

来自华南农业大学历史学专业的戴瑞对AI并不陌生。戴瑞第一次领教AI幻觉，是在写论文找文献时。“把主题‘喂’给AI，它会编出不存在的学生、论文，还像模像样的，但去知网一搜，根本查不到相关信息。”如果不加核查，那些虚构的作者和论文都能被老师一眼识破。

除了编造文献，AI还会犯“张冠李戴”的错。戴瑞曾让AI梳理历史事件，结果年份和史实对不上，“比如把A年份的事件说成在B年份发生，或者把甲做的事说成乙做的”。这些错误让她不得不返工，“本以为大功告成，结果前面全是虚假信息，只能推倒重来，重新核对史料。”

调查显示，在受访大学生使用AI时，57.63%受访者遇到过数据或案例引用错误，55.03%受访者面临过学术参考文献推荐错误，50.86%受访者遇到过AI给出的常识性知识错误。

在上海一所高校读博士的申杰也经常遇到AI反馈虚假文献的情况。AI会给出一些文献的链接，但点进去后是“404”，也有时AI不提供来源链接，申杰按照文献名到学术网站上检索后，发现“查无此文”。“当我给AI工具反馈这篇文章不存在时，它还会‘嘴硬’，说这是因为我没有认真检索，还会给出一个假的论文来源链接。”当申杰拿出“实锤”——检索截图，AI工具则一言不发，或者开始道歉。

即将就读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班世钊，回想起去年决定报考方向时咨询AI的情景，觉得AI给出的建议并不总是贴合实际。

“虽然AI对于标准明晰的指标分析非常理性，但是一旦涉及更加复杂的情感决策时，它就容易出现偏离实际甚至是胡编乱造的情况。AI为了说服我选择一位导师，编造出了这位老师从未公开发表的言论。”

在一次简历投递前，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高育格请AI润色她的简历。“AI为了‘佐证’我的能力，编造出了这个项目的商业交易总额、场观人次等数据。”作为活动的亲

历者，她感到啼笑皆非。

谈及AI幻觉的社会影响，翟锐捷很认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关于“AI内容生态”的观点：“当社交媒体90%的内容由AI生成，且公众缺乏甄别能力时，就会陷入李普曼所说的‘拟态环境’困境——人们认知的世界不再是真实世界，而是AI建构的虚假镜像。”翟锐捷觉得更值得警惕的是AI的认知偏向，“比如我曾问过不同国家的AI模型什么是‘世界最伟大的四个字’，它们会给出不同答案，这本质上是算法背后的价值预设起着作用，若被当作‘客观事实’传播，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

谈及AI幻觉的影响，戴瑞认为对学术冲击很大：“历史研究靠史实说话，AI编造的虚假史实完全不符合规范。要是连年代、事件都错了，基本史实都保证了。”

调查显示，导致作业/论文/工作出现错误(57.70%)、浪费大量时间验证信息(52.29%)、误导决策或研究方向(44.35%)都是受访大学生认为AI幻觉带来的不良影响。

“写专业课作业、搜集史料时不用AI，得自己翻书查文献；但写诸如发言稿、总结纲要时，使用能节省时间。”戴瑞强调，AI带来的是灵感还是抄袭，全在一念之间，“别让自己的思维变懒惰、僵硬化。”

理解AI规则，拨开信息迷雾

申杰在一则新闻上看到，一位用户向AI工具提问，某座城市的立交桥为什么采用某种设计方式。然而，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该城市的立交桥设计并非用户描述的那样，但AI工具没有指出问题的谬误，而是迎合提问者，编出一套理由来回应。“有些AI模型的底层逻辑，就是要优先回答用户的问题，而不是先判断用户提问是否符合实情。还有一些AI工具不联网，就更容易给出偏离事实的答案。”

班世钊观察到，当AI无法调用已有资源解答他的困惑时，它往往会搜罗甚至编造一些看似和他情形相近的例子试图说服他。有时AI回复“那么我可以从以下具体案例入手”“应该结合一些具体案例”，事实上这些案例往往真假参半。

AI的这一特性引起了班世钊的兴趣。他比较了几款热门AI软件的解答思路，感受到“AI幻觉”的产生或许源自它们极强的“服务意识”：它们一直试图为用户提供逻辑闭环、有头有尾的“满分”解答，即便是面对超出它分析能力的提问，它也会“冒险”作答。

在新闻实操中，翟锐捷多次遭遇AI的“幻觉陷阱”。例如在专业课上，老师要求模拟报道珠海某新闻事件时，由于官方信源有限，AI竟自行编撰“内部文件”和“匿名访谈”来补充细节。“这些内容逻辑自治，甚至标注了‘据知情人透露’，但溯源后发现这些全是虚构的——这其实是AI在训练数据不足时，通过算法预测进行的‘信息补全’，但这却违背了新闻采集中‘信源可追溯’的基本要求。”

当怀疑AI提供的信息存在问题时，65.43%受访者会使用其他搜索渠道交叉验证，60.37%受访者会查阅权威书籍或者文献，45.79%受访者会咨询老师或者专业人士，42.09%受访者会通过实操操作验证。

如今，核实信息已经成为高育格使用AI时必不可少的步骤。她有时觉得自己不像是发出指令的用户，反而是AI的检测仪。虽然大部分错误她能够一眼看出，但是在面对陌生领域的知识时，她也会感到力不从心，而一些“七分真三分假”的文本更是大大增加了她

检验的时间成本。“每次大费周章核实信息之后，我都会产生‘还不如自己写’的心情。”

申杰发现，一些AI工具在给出涉及健康、安全领域的答案时，会有特别提示。他最近帮朋友询问了耳鸣和手指发麻可能是什么问题，AI工具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重要声明：我是人工智能，无法提供医疗建议。以下信息仅供参考……强烈建议尽快咨询医生”，“尽快咨询医生”还被加粗显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让用户警惕，AI的话不能全信。”

善用而不轻信，用理性思维校准“AI滤镜”

“会不会是我们对于AI的期待太高了？”对于班世钊而言，“AI幻觉”的存在使他重新思考自己与AI的关系。他一度认为，AI所呈现出的超强检索、整合与输出能力能够帮助他抵达思考的最后一站；而在一次次复杂情境之中，他意识到AI终究难以深入理解个体的真实处境，AI可以成为他的有力助手，但不该由它们按下决策键。

调查发现，12.66%受访者对AI幻觉表示非常担忧，48.67%受访者表示比较担忧并在使用时格外谨慎，32.03%受访者认为这是技术发展的正常现象，6.64%受访者对AI幻觉并不担忧。

为了避免被AI误导，戴瑞会用知网或专业数据库交叉验证。她尽量不去依赖求助老师，主要靠自己查证，“老师大多反对用AI找史料，认为这会丢了历史学科的严谨性，但支持用AI做总结或梳理思路。”

在翟锐捷看来，在AI时代必须强化AI素养：“这不仅是辨别信息真伪，更要理解AI生成内容的逻辑——它本质上是对既有数据的重组，而非原创。就像写新闻时，AI可以帮你提炼政策背景的大纲，但采访细节、信源核实必须亲力亲为。”他建议学校在课程体系中加入“AI内容甄别”模块：“比如通过案例教学，分析AI如何编造信源，或开展模拟报道实训，要求用AI辅助时必须标注每处信息的溯源过程，以此强化‘求证意识’。”

要判断AI给出的信息是真还是假，用户需要哪些层面的能力？

申杰专门就此问题询问了AI，得到的答案是需要知识储备、批判性思维和主动查证的能力，以及对AI工作原理的理解和使用AI工具的实践经验。其中后两项是可以经过特定的培养和训练来实现的，正因如此，他觉得提升AI素养、弥合数字鸿沟的科普课程是必要的。

“代际反哺也很重要，年轻人也可以给自己的长辈多做普及。”申杰觉得如果把AI当作“大脑”来使用，可能比较容易被AI幻觉影响，“但如果仍保留有自己的思考，只把AI当作辅助消化的‘肠胃’，能更好地排除AI生成内容的不良影响。”

调查发现，74.26%受访者希望提升研发技术、优化算法模型、严格数据治理，63.79%受访者希望完善人工审核干预与用户反馈机制，58.25%受访者希望开发实时纠错提示功能，50.31%受访者期待AI向用户明确标注信息可信度，39.01%受访者希望制定行业标准、加强监管力度与从业人员教育培训。

翟锐捷最期待AI工具“信源透明度”能够提高：“就像学术论文必须标注参考文献，AI生成的每一条事实性信息都应附上溯源链接，这可以降低用户的核实成本。”

在高育格看来，AI对用户足够“坦诚”或许可以成为研发团队的下步目标。如果信息并非源自权威期刊或是官方报道，那么AI应当充分、清晰地提示这一点。“我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外壳，而是有扎实基础的答卷。”

(应受访者要求，申杰为化名)

令人心动的社团



厦门大学机器人爱好者联盟

厦门大学机器人爱好者联盟成立于2008年。社团深耕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了涵盖机械设计、硬件开发、嵌入式系统和智能算法的完整技术体系，形成了阶梯式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一批爱创新、会动手、能协作的科技精英，在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中屡获佳绩。社团发起海峡两岸大学生机器人竞赛与工程教育交流会，搭建了两岸青年科技交流的平台。社团曾获评福建省高校“活力社团”，并获得2025年福建省高校“科创类”社团精品项目一等奖。



南通大学大学生心理协会

南通大学大学生心理协会成立于2005年，由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中心指导，以“完善自我、服务他人、共同成长”为宗旨，发挥朋辈引领与陪伴作用。协会积极组织“四季心育”活动，探索浸润式、互助式、滋养式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打造了“千人手语”“音乐下午茶”“润心书咖”“五色心理互动街区”“心理微电影大赛”“心理情景剧大赛”等品牌活动。



郑州科技学院3D打印协会

郑州科技学院3D打印协会成立于2015年，本着“树立时代精神、启迪创新思维、探讨学术科研、锻炼实践能力、丰富课余生活”的宗旨，引领全体成员在锻炼中学会自强、在实践中学会创新，为培养有知识、有素养、有文化、有技能的大学生作出努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灼目戏剧社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灼目戏剧社始终坚持“根植校史，立足校园，感受舞台，体味人生”的理念，秉承“做戏，我们是认真的”的宗旨，协助并鼓励社团成员在舞台上释放自己的表演能力，用角色诠释生活。



信阳农林学院植物保护社团

信阳农林学院植物保护社团以植物保护为核心，开展知识竞赛、实地考察等活动，如举办“昆虫知识趣味竞赛”活动。成员们在实践中提升专业技能和团队精神。社团丰富了校园文化，为同学们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助力专业人才成长。

梅从政 刘希勇/整理

吉大张贤明：深耕政治学理论37年

实习生 田韵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王军利

2025年6月16日，张贤明在报告厅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为毕业生们一一拨穗。自2024年12月卸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以来，张贤明有了更为充裕的时间同青年师生在一起。“我终于能全身心地回到学生和教师的最根本身份。”张贤明愉快地说。

“院长是任期制，学者是终身制。算下来，我这个湖北人东北学习工作已经整整37年了！”张贤明说，“高中时，我接触到我国著名政治学家王惠岩先生编写的《政治学原理》，这本书让我大受启发，这令我萌生了跟随王惠岩先生、前往东北求学的想法。终于在1988年，我如愿考入吉林大学政治学系，开启学术生涯。”

1995年，张贤明放弃到北京工作的机会，选择继续跟随王惠岩攻读博士学位。“我并非没想过离开东北回到南方，但实在感激王惠岩先生与吉林大学的培养，让我有机会走出湖北农村，感受东北厚重博大的工业文明，并在政治学的广阔天地有所作为。经年累月，我

怎能轻易转身离开？”他引用王惠岩的话说：“我们留人，不靠法律、不靠纪律，靠的是良心。”

跟随王惠岩求学的10年间，张贤明为自己的学术生涯埋下了一条“草蛇灰线”。王惠岩撰写的咨询报告曾被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参考。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一道明确下来。因此，围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行理论阐释，为现实的制度改革凝聚观念共识，成为王惠岩后续的工作主线。“理科靠实验，文科靠文献。对于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文献的爬梳、会通，为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扫除思想障碍。”张贤明说。

张贤明至今忘不了初读王惠岩的《论民主与法制》时豁然开明的感受，这让他感到自己这代政治学者担负着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向前的历史责任。2001年，在王惠岩的指导下，张贤明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政治责任》获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每年获得这一荣誉的论文不超过100篇。“其实我也曾犹豫是否应超越对‘政治责任’这样一个基础概念进行研究，尤其当时关于政治责任的理论资源远

远称不上丰富。”张贤明回忆，“幸好坚持做了下来，我才能为民主理论提供一个相对新颖的视角。”

“过往的民主理论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责任的基础性作用。如果不能分清责任、落实责任，再精致的民主理想都将流于空谈。”张贤明说，“在《论政治责任》中，我提出人大代表与政府组成人员是我国主要的政治责任主体，应当完善罢免职务等政治责任的追究方式，保障其政治责任的实现；并且应当特别重视通过法定程序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这既是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利器，由此衍生的理论议题正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其实早在2005年，我就针对官员问责的政治逻辑、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展开了系统研究。”张贤明说，“我并不提倡青年学者盲目地追热点，当你在一个领域持续深耕，热点总会追上你。”

“当然，不追热点并不意味着不闻时政。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同样需要加强成果转化，更好地服务社会。王惠岩先生能立足政治学基础理论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我们要以他为榜样。”张贤明介绍，“近十年来，我们持续围绕吉林省党风廉政建

设公众满意度开展调查研究，每年我们的调查报告都会被省纪委全会报告作为重要数据参考，并报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也算为决策科学化尽了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份责任。”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深入推进而不断发展，协商民主深深嵌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背景下，我与同事们创办了《协商治理研究》期刊，迅速汇聚起一群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学界同仁。”张贤明说，“以强有力的平台建设支撑学科建设，是我们学院发展的重要经验。深化学术研究不能仅靠个人单打独斗，‘集团军作战’是现代学术发展的趋势。想在东北地区打造社会科学高地，我们就必须筑巢引凤、树人育才。”

30年的从教生涯中，张贤明指导了206名研究生。“我在国外访学期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方兴未艾，这让我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效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于是我与研究生马雪松通过邮件往来，促使他决定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研究方向。”张贤明说，“如今，他已是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2023年还修订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政治制度’词条，为当代政治学研究更新了概念基础与

逻辑起点。”

除了培养学术人才外，张贤明还十分重视干部培训。1993年，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成立。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高校中首个恢复建立的政治学系的奠基人，王惠岩认为，“行政学院”这个名称意义非凡，它巧妙地将吉林大学的命运，与其与诞生于解放战争烽火中、肩负培养革命干部使命的东北行政学院紧密相连。“我们当然有责任发扬这一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先后承办了60余期干部培训班，培养学员超4000人次。”张贤明说。

“干部培训班中，一些青年干部展现的求知欲、进取心与意志力令我印象深刻。记得2024年6月，我受吉林省纪委监委邀请作专题报告。会后，一位青年干部兴致勃勃地与我讨论中国传统廉洁思想的现代转化，从她的眼中我能看到在廉政文化阵地建功立业的渴望。”张贤明说，“相较于我们这代人，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与青年干部往往知识储备更为丰富、格局视野更为开阔。在数据洪流的冲刷下，我们都要学会保持战略定力，不让注意力‘在风中飘荡’。而我们这代人更有责任去营造真正关心支持青年成长的氛围。”